

人民政协是怎样创立的

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会议通过了“人民政协组织法”“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新中国的国都、纪年、国旗、国歌4个议案以及“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组织法”对人民政协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性质定位、职能作用等作了规定,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制度安排的人民政协正式创立。

随着我党在军事上转入战略反攻,毛泽东号召“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3月和4月,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出尔反尔,否定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组建由中共和民盟参加的临时联合政府的决议,派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我军被迫进行自卫反击。1947年下半年,我党在军事上转入战略反攻,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48年春,陈嘉庚和沈钧儒建议中共尽快成立联合政府,以对抗国民党的伪国大,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4月25日,毛泽东提议召开书记处会议,其中议题之一就是邀请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代表到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4月30日深夜,经毛泽东审定后的“五一口号”,由新华社正式向外发布,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充分考虑到了建立民主国家的合法程序。“五一口号”将反动派排除在政治协商会议之外,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

毛泽东在1949年元旦献词中,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作为当年的主要任务。1

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声明愿在中共领导下,期待革命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早日实现。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承担着完成“协商建国”的特殊历史使命

我们说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担负着特殊历史使命,是因为它在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同时,又行使政治协商的重要职能,完成协商建国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特殊历史使命,194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即开始筹备新政协,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中国第一次由我党领导下的政协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6月15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常务委员会,毛泽东被推选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下设6个小组,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在此前后,在周恩来指挥下,民主人士陆续安全地到达北平并受到礼遇,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住处亲切接见了司徒美堂、柳亚子等大批民主人士,到正阳门火车站迎接宋庆龄与程潜。共产党人宽阔的胸襟、谦虚的态度赢得了民主人士的高度赞誉,陈叔通感慨地说,我看到的历代最高统治者,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惟独毛泽东不是如此。

筹备工作最难的还是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人选名单和“共同纲领”的起草。李维汉负责的小组经过和民主人士多次协商,最终确定新政协代表662人,其中特邀代表75人,从而使新政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毛泽东看到周恩来送来的参加新政协的人选名单时幽默地说:“这就是一本天书嘛”。

“共同纲领”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合政

府的施政纲领,起到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周恩来负责起草工作,1948年10月下旬写出了第一稿,名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在讨论过程中,民主人士章伯钧、蔡廷锴等人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建议由新政协行使人民代表会议职权,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提议被中共中央采纳。1949年春,随着江南大片地区被解放,《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重新制定。周恩来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一周时间,八易其稿,经毛泽东审阅,命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其中“新政治协商会议”也改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进入9月,又根据迅速发展的形势,再一次重新起草“共同纲领”,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毛泽东、周恩来为制定“共同纲领”呕心沥血,仅对第三次起草的“共同纲领”,毛泽东就修改了200多处,周恩来修改了100余处,至少十易其稿。“共同纲领”三次起草过程,均广泛吸收了民主人士的政治纲领或主张。周恩来感慨地说,“共同纲领”是各党派共同千斟万酌的结果。民主建国会代表章乃器深有感触地说,在讨论“共同纲领”时,“做到了多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

由于准备工作太过繁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时间由8月初改为9月10日,后又改成9月21日。毛泽东在开幕词中以诗人般的气质豪迈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并高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人民政协成立对我国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民政协和由国民党主导的旧政协相比

有着本质的不同。人民政协虽然沿用了旧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但从其组织和性质来说,绝不是发源于旧政协。旧政协是反动派为主体的,是带有妥协性的;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参加者是一切民主阶级和阶层的代表,一切反动派都被排除在外。还有,人民政协是长期存在的、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因此,人民政协的成立对我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一,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重要组织长期存在被确立下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委会上,周恩来向各民主党派阐述了共产党的主张,即人民民主国家需要统一战线,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不应该开一次会议就结束,而应该长期存在。人民政协是个长期性的组织,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统一战线。毛泽东说,政协全体会议闭幕后,要有一个经常性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要固定一下,就叫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人民政协“将长期地继续在中国存在,并将一切必要的地方建立它的地方组织。”中共中央的上述主张,反映到“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组织法”中,以立法形式确立了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使其长期存在下来。

其二,人民政协不是权力机关,而是协商机构。“共同纲领”“人民政协组织法”都规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代行人大职权,在人大召开以后,人民政协还可以就国家建设的根本大计及其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仍有建议权。就政府来说,国家大政方针,都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人大职权,拥有立法权、选举权和决议权,所以成员叫“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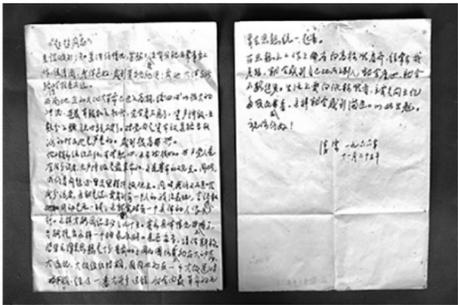
1949年10月10日出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后,因为权力已授予中央人民政府,政协就不再行使权力了,变成专门协商机构,由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则称“委员”。

其三,人民政协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这种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塞缪尔·亨廷顿通过对世界政党的研究认为,一党制发展中国的政治秩序要明显优于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具有一党制的优势,且能和其他政党同舟共济,共创美好未来。“共同纲领”中表明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组织形式是人民政协。民主党派不再是在野党,而是和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下来。

从“五一口号”发布,到人民政协成立,政协的长期存在、性质定位和职能作用等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且载入“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组织法”,整个过程就是人民政协作为中国特色制度安排的过程,这种既不同于西方国家议会制度,又有别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统一战线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制度安排对我国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赵连稳

往事



彭德怀写给侄儿彭起超的家书复制件

毛泽东曾赠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

(一)

起超同志: 来信收到,知道你们情况,甚慰。我没有分配日常事务工作,很清闲,身体还好,感到有力无处使!其他大体与北路门时相差不远。……

共产党人是有成分论者,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这是基本的观点。因此,我们看问题必须坚持阶级观点。同时,我们又不是唯成分论者,这就是说,要看到每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言论和行动是否一致,这就要对每一个具体的人作具体分析……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国际高处在动荡、大混乱、大改组时期,国内也处在一个大改组时期……将会由最革命的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

在思想上工作上应向高标准看齐,经常去找差距,就会感到自己比不上别人,就会虚心,就会不断进步。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主要是向五亿多农民去看,这样就会感到满足。以此共勉。祝你们好!

彭德怀的两封书信

清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午

这封信是彭德怀在成都时写给侄儿彭起超的最后一封信。如今在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彭德怀纪念馆,陈列的是由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复制件。

当年11月上旬,彭德怀接到侄儿彭起超的来信,在食品公司上班的彭起超对本单位的相关部门组织看不惯,认为这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在出身等方面是有问题的。当时,社会上的“反动血统论”泛滥成灾,“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荒诞逻辑在年轻学生中仍有市场,彭德怀对此颇感忧虑,于是他给彭起超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其中“思想上工作上应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体现出老一辈革命家对后辈的谆谆教诲,也是彭德怀自己身体力行、终生不渝的人生准则。

彭德怀对侄儿彭起超无微不至的关心就像暖阳,吹进了从小便失去父亲陪伴的彭起超心中。侄儿彭起超是彭德怀的弟弟彭荣华烈士的孩子,在彭荣华为革命牺牲后,彭德怀不仅在生活上照顾着侄儿侄女们,更是关心他们的工作,时刻鞭策、悉心教导,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

这封信的署名为清宗,这是彭德怀父亲根据宗

钩沉

字辈分替他起的大名,含义是将来长大了有出息,有了荣华富贵,还要清清白白做人,对得起祖宗。彭德怀为人刚正不阿,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侄儿侄女更是仁慈。他的不谋私利、克己奉公是一种极高境界的自觉,有制度约束是如此,没有制度约束也仍然如此,他的清正廉洁如同水晶般纯净剔透。

(二)

报委同志:

湘潭报从创刊号起即按期收到,使我对于了解乡情况和增加农村生产知识,深为感谢!从收到的几期报纸看,对于介绍生产中的先进经验、宣传中心工作,都起了重大作用。对于勤俭办社、民主办社、克服困难、以社为家的宣传,特别是这类典型介绍,似乎还不够多,我的看法不知是否合乎实际,请原谅!

此致同志之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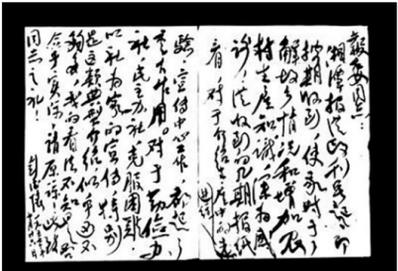
彭德怀 一九五七年七月廿六日

这是彭德怀收到中共湘潭县委机关报报委寄给他的几期《湘潭报》后,于1957年7月26日写给湘潭报委的亲笔信。《湘潭报》于1957年8月1日以《“八一”前夕彭德怀元帅来信对本报作了重要指示》为题报道并刊登该信,指导和推动了全县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1961年5月8日《湘潭报》停办后,这封信连同报社的档案资料被移交到湘潭县档案馆。

《湘潭报》是中共湘潭县委机关报,其任务是面向农村、面向农民,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和推动全县各项工作。创刊于1956年3月12日,初期为8开小报,每周五出版,发行量为2万份。1957年7月1日,扩大为4开报。后曾改周双报、双日报。1961年5月8日停办。

《湘潭报》报道彭德怀来信后,报社领导班子根据该信的建议,进一步加强勤俭办社、民主办社、以社为家的宣传,开辟“细心话”言论专栏,加大对各类先进典型的深入挖掘和报道,深受广大干部群众喜爱,有效推进了湘潭县经济社会建设。该信表达了彭德怀对国家建设的关心,对农村、农业、农民关心,也蕴含了他对故乡的特殊感情;同时,也反映了他勤俭节约、发扬民主、爱国爱民的思想作风,体现了他对新闻宣传的方法论,以及谦谨君子之风。细读此信,更能感受到彭德怀为民、务实、清廉的精神与深刻内涵。 □许心星 张娜 谢伦炳



彭德怀写给湘潭报委的书信原件

邓宝珊与陕西靖国军

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副主席,著名爱国将领邓宝珊将军,少年参加新军,远戍伊犁;在风云激荡的革命民主思潮影响下,他怀着爱国之志,毅然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从此走上了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人生旅程。他长期在陕西从事革命活动,三秦大地上留下了他的历史足迹。

华山聚义,共商讨袁大计

邓宝珊出身贫苦,15岁时投身军旅,立志报效祖国。1910年7月,在新疆伊犁“新军”中当兵时,加入了同盟会。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伊犁革命党人积极响应。1912年1月7日,发动了伊犁起义,在参加攻打清政府伊犁将军署的统领衙门惠远城的战斗中,邓宝珊勇立战功。袁世凯窃取民国大总统宝座后,千方百计分化瓦解伊犁临时革命政权。起义总指挥冯特民和李辅黄等一大批同志惨遭暗杀,邓宝珊也被列入通缉名单。1913年初夏,正在将弁堂学习的邓宝珊潜出伊犁,经西伯利亚回到故乡。他辗转回国途经西伯利亚时,巧遇被沙俄流放的斯大林。交谈之间,斯大林对邓宝珊欣赏有加。

邓宝珊回到天水不久,便赴陕西关中寻找革命同志。1914年夏秋之季,聚集在陕西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激于大义,相互结纳到华山脚下玉泉院,以“讲学”为名,共商讨袁大计,史称“华山聚义”。主要成员有:陕西郭希仁、井勿幕、胡景翼、张义安、董振武、高世英、刘守中、史宗法、刘露如、岳维峻、山西续桐溪、李岐山、续范亭、福建何遂、河北孙岳、甘肃邓宝珊等。此后,革命党人以陕西三原为中心,开展武装斗争。袁世凯称帝,陕西讨袁护国军成立,胡景翼任第一旅二团团长,邓宝珊任该团“十大连”中之第七连连长。1917年9月,孙中山在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陕西革命党人起而响应。靖国军时期,孙中山曾致信邓宝珊,“藉问劳苦,并以力助”,鼓励他“坚持初志,百折不挠”。

华山聚义,是北方革命党人自发进行的一次革命联络活动,也是一次凝结北方民主革命政治军事力量的聚会。虽然没有制定具体行动纲领和计划,但实质上形成了一个政治军事集团,确定了立足陕西,扼关中出潼关,会同全国革命党人为推翻袁世凯政权,打倒北洋军阀政府而奋斗的基本目标。后来,华山聚义的大多数成员,都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军的骨干力量。

人物春秋

三原起义,讨陈护法

1916年6月袁世凯忧惧而死,接管“北洋军阀政府”大权的段祺瑞,任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办陕西军务。陈树藩督陕后,残酷屠杀革命党人,激起陕西革命党人和爱国志士群起反对。

1918年1月,邓宝珊、张义安等部队驻防陕西三原时早已蓄意反陈。当陈树藩剿杀陕西革命党人郭坚、高峻等部时,邓宝珊、张义安认为“三原要地也,得之不可失”。他们明里张罗部署东进,邓宝珊暗中与张义安、董振五等人积极准备发动起义。1月25日,大雪飞舞,邓、张、董一声令下,备补营“乘雪夜兴兵”“声势激雷电”,三原起义终于爆发。经两昼夜激战,邓、张、董等部全歼陈树藩的亲信旅长曾继贤、团长严飞龙部,曾、严二人仓惶逃匿,推胡景翼为右翼总司令,曹世英为左翼总司令,推动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发展。

邓宝珊与张义安、董振五发动的“三原起义”,树起了“陕西靖国军”义旗,推胡景翼为右翼总司令,曹世英为左翼总司令,推动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发展。

英勇善战,被誉为靖国军“三员战将”

1917年后,邓宝珊将军曾任陕西靖国军右翼胡景翼部总指挥,靖国军第四路胡景翼部营长、团长,他与杨虎城、张义安被时人并称为靖国军“三员战将”。

邓因足智多谋,被誉为“小诸葛”。当时靖国军内部产生分歧,加之张义安在陕西西乡县作战牺牲,部队陷入困境。于右任接受邀请从上海抵达三原老家,整编部队,就任总司令。邓宝珊善战多谋,被任命为第四路军胡景翼部团长。孙中山电令西南靖国军出兵援陕,此时,邓宝珊与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19年1月,邓宝珊与靖国军董振五、冯子明、杨虎城等驻大王村一带,在大王村东与奉军鏖战,奉军败退。1月27日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军总

指挥董振五牺牲,时年26岁。民国元老、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在《陕西靖国军董振五少将墓志铭》中说:“勿幕不独文,义安不独武,后起之英,厥惟振五。大雪漫漫,周原靡靡,遗恨难忘,河山金鼓。大王村之血,白龙坛之虎,关西壶浆之遗民,渭北薪胆之旧部。祝英灵兮归来,问来归兮否否。水火深矣,哀哀三辅!碧血青山,皇天后土。”

邓宝珊看重革命的情谊。解放后,原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军械处长、靖国军第四路军械处长高又明卧病在床期间,时任甘肃省省长的邓宝珊和辛亥时期陕西都督、陕西省副省长张凤翔等曾前往亲自探视,嘘寒问暖。

北京政变,史册昭昭

1924年,邓宝珊参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领导的“北京政变”(又称“首都革命”),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是,从此露出头角于中国政治舞台。邓宝珊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可谓忠贞不二,史册昭昭。

北京政变前夕,受胡景翼之命,邓宝珊、李纪才直奔京津,在丰台、玉田、滦州一线布防,与留守通州的李虎臣一起,策应冯玉祥进京,有力地配合了冯玉祥回师北京的军事行动。

北京政变后,邓宝珊按胡景翼的安排,到古北口见冯玉祥,通报了情况。冯玉祥决定立即班师回京。

北京政变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时,吴佩孚如梦初醒。他得到北京政变的消息,急忙挥师天津,以曹錕的名义,电令冯玉祥、湖北各军火速北上增援,讨伐冯玉祥、胡景翼、孙岳。

李虎臣、李纪才、张之江、刘郁芬等受命聚集在杨村以西,准备向吴佩孚发动进攻。岳维峻、邓宝珊已占领了唐山。兵临城下的吴佩孚,困兽犹斗,拒不投降。胡景翼下令总攻,取得了杨村战役的胜利。吴佩孚看大势已去,只好从塘沽下海,向南逃窜。胡景翼进驻天津,讨吴战争宣告正式结束。

北京政变,迫使曹锞下台,消灭了吴佩孚,把溥仪赶出了皇宫,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马萌